一、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概述

宰相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形成与演变都以特定的社会和历史阶段为背景。研究宰相制度的演变，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宰相制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。宰相为百官之长，后也称相邦、丞相、相国或假相等。一般来说，以对君主负责总揽政务的人为宰相。宰相有主持、辅佐之意，但历代所用官名和行使职权的方式各有不同。宰相制度的上述变化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王权的完善相联系的。春秋各国为了应付大规模而又频繁的战争，既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调遣的庞大常备军，也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，以便有效地组织全国的人力、物力。于是，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，在中央设置由国君直接任免的辅相和将军负责统帅文武百官，已成为历史的必然。春秋时期，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、太宰，然而这与后世以宰相作为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有所不同。

自秦汉以后，官制渐趋复杂。秦灭六国，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，确定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官僚体制，宰相制度在这一时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

得以形成，其职责是统领百官，协助皇帝处理国家的军政事务。西汉初期基本沿袭秦制，但自汉武帝以后，皇帝经常通过内廷管理文书的尚书台亲自裁决政务，并把秦时的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逐渐改名为大司徒、大司空、大司马（也称“三公”），以此削弱丞相的权力。东汉时，正式发号施令的机构为尚书台，三公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，只能办理一些例行公事。东汉末年，曹操掌握军政大权，自任丞相，将宰相的权力推向极至。

称帝后的曹丕以尚书台权力过大而设中书省。中书省掌握机要，负责起草和发布政令，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，而尚书台则成了执行机构。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，作为皇帝的侍从和顾问机构，长官为侍中。侍中的地位不高，却因近侍皇帝而握有大权。及至南北朝，国家颁布重要政令前，皇帝都征求侍中的意见，门下省遂成为参预国家大事的机构。可以说，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，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现象，即宰相皆因人而设，无定员，无定名，也无定职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即能掌握实权的宰相都必须加上“录尚书事”的称号，以此区别于不处理日常公务的其他宰相。

隋唐五代的官制大致相同。隋代，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机要的机构主要是尚书省、内史省（后称中书省）、门下省。三省长官皆为宰相。李世民即位前曾做过尚书令，大臣为回避之而不敢居其职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，与门下侍中、中书令

同为宰相之职。自隋朝以来，因宰相品位尊崇，皇帝一般不肯轻易授人，故常以他官如“参知政事”或“参议得失”等为相。名称虽然不同，却都是宰相职位。唐高宗时，则用其他官员以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或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的头衔参预朝政，执行宰相职权。中书令、侍中反不常设。以后，“同平章事”就成为宰相的衔号了。

宋代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。宰相的权力日小一日，权力越来越集中于皇帝。在宋代的中枢机构中，真正掌握实权的是“宰执”（即宰相与执政的统称），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副职称参知政事。参知政事又称“执政”，这一官职是宋太祖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。

忽必烈建立元朝，沿袭宋代的职官制度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官僚机构。元代废除门下省、尚书省，中书省，政务中枢， 丞相 、平章政事为宰相。皇太子为中书令、枢密使，领宰相之虚衔，实权则归左右 丞相。蒙古人尚右，以右丞相为尊， 丞相之职也仅限于由蒙古人担任。右左丞相之下，有平章政事 4 人，从一品掌管机要，为丞相副职，凡军国大事，悉由他们裁决。

明朝初年，在中央设立中书省，有左右 丞相总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事务。后因 丞相胡惟庸专权被杀，中书省遂被明太祖朱元璋所废，由皇帝直接处理国家大事，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此后，明又仿照宋代殿阁学士之制，设大学

士，充当皇帝顾问，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上。但内阁大学士内受制于宦官，外无用人之权，独立发挥作用的机会很少。仁宗以后，内阁专门负责批答文章，草拟诏令，品位渐次提高，权势也随之增大，甚至超过以往的宰相，号为“辅臣”。

清初沿袭明制，设立内阁。但国家大政决策者是“议政五大臣”，阁职渐微。雍正时，另设军机处于内廷，由满汉大臣出任军机大臣专司传达皇帝旨意、处理军政要务、任免官员和向皇帝呈送重要奏疏等，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。综上所述，秦汉以后历朝皆有宰相制度。秦汉之丞相、三公，唐宋之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长官及同平章事，明清之大学士等，皆谓之宰相，只不过名称各异。历代的宰相制度，虽然既有因袭又有沿革，但无一例外地都是皇帝不断以内廷私人机构制约外朝宰相，削弱宰相职权。汉代以内朝尚书制约外朝丞相；唐、五代以翰林学士、枢密使分割宰相职权；明代以内阁大学士取代中书职权；清代以军机大臣架空内阁。宰相制度的变化，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。皇权日重，相权渐轻，这是中央集权日益巩固的必然结果。正如史学家所言，宰相议政，由汉唐时的“坐而论道”到宋时“站而论道”，明清时则“跪而论道”了，这形象地反映了宰相地位的变化。宰相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可以说，宰相权力的大小，宰相个人素质的优劣，都直接关系到政局的安危。如

秦前期、西汉，相权比较稳固，国家安定繁荣。东汉、唐朝中后期、宋朝中后期、明中叶，相权削弱，外戚、宦官把持朝政，朝廷危机四伏，天下纷乱。相权重，国势则强；相权轻，国势则弱。从另一方面看，宰相的能力与素质，不仅影响着其政绩，而且关系着封建王朝的兴衰。中国历代都曾涌现出一些著名的宰相，如管仲、萧何、曹操、诸葛亮、魏徵、王安石、张居正等，他们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功绩，为世人所称颂。而奸相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，如李林甫、杨国忠、秦桧、严嵩、和珅等，他们或擅权乱政、祸国殃民，或搜刮民脂民膏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深重灾难，而为世人所唾骂。还有一些庸碌无为的“伴食”宰相，他们本无大才，却能以一身媚骨谋取高官厚禄而使官制日趋腐败。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里，无论是有作为的杰出宰相，还是奸恶或无为的宰相，他们无不在皇帝的控制之下，其作用不过是皇帝的管家、封建皇权的守护人而已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

二、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制度及人物特色

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。奴隶制的东周王朝日趋没落后，各诸侯国为谋取霸主地位，纷纷招纳具有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贤士，委以重任，并确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，建立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。官僚机构是以“相”和“将”为首脑的国家机器体系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“相”与秦汉以后的宰相官职不太一致。此时封建专制国家尚未完善，封建集权制还刚萌芽，宰相的权力相对较大，诸侯只有依靠“相”的辅佐，才能成就大业，“相”的才能因此得以充分施展。例如管仲相齐时，把处于东海之滨的小小齐国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以至通货积财，国富兵强。齐桓公在其辅佐下，九次会盟诸侯，成就霸业。战国初期，魏相李悝通过变法的新政策，使魏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，成为当时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。当时，西方的秦国社会经济落后于东方六国，它以商鞅为相实行改革，并借鉴各国变法经验，制定了有力的变法措施，使秦国后来居上，到秦王嬴政时，国富民强，从而一举兼并六国，统一了中原大地。到战国中后期，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

上升为主要矛盾，宰相的功绩主要是外交上的成功。例如赵国名相蔺相如以不辱于强秦“完璧归赵”而著名。挂六国相印的苏秦，运用外交手段，使六国能够按照他的“合纵”思想和战略联合起来，共同抵御秦国的兼并。秦相张仪则利用外交谋略，在六国间施展“连横”策略，有效地瓦解了六国联盟，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一般源于“士”。“士”是在奴隶制瓦解、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。其间，一部分贵族及其子弟因世袭制的覆灭而成为“士”。同时，出身庶民的人，也有跻身于“士”的可能。从“士”的行列中脱颖而出的宰相，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变法革新和谋求统一的历史潮流，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。

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宰相官职的设置上极不统一，其涵义与秦汉以后相比也比较空泛。宰相是“宰”和“相”的合称，前者为主持、后者为辅佐之意。春秋时，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、太宰或相，但这些官职只由某些卿大夫世袭。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相，其设立当萌芽于春秋的齐景公所设之左右相。战国时期最早设相的国家是魏国，继后是韩、赵两国。秦国置相较晚。秦孝公时，商鞅由魏入秦，始为左庶长，后升大良造，时未称相，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，史称“商鞅相秦”。赵国除丞相外，还有假相、假相国和守相。“假”意为兼理；“守”意指试用。战国时期的宋、

卫、中山、东周等小国皆未设相。南方的楚国，在官职设置上自成一体，令尹为最高级的官称，相当于中原官制的相。尽管各国宰相设置的名称各异，其职权仍十分相似，即国君的助手、参谋、顾问，其权力不像秦汉以后那样受到皇权及内外朝官员的分割。

战国时期的宰相文武分离。相职一般由文人担任，只负责国家的政务；在军事上则由擅长兵法的最高军事长官即将负责（其职位仅次于相），以适应各封建国家统辖区域的扩大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。

战国时期有些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，也有个别宰相原本是投机者，借七国纷争之乱，四处游说，使某个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，以求高官厚禄，如秦相张仪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。更有甚者为秦相吕不韦，他初与他国人质王子往来，只是因为王子“奇货可居”，想从中取得更大的财富而已。尽管如此，这一时期的宰相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。

1.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

少通诗书，文韬武略，辅佐桓公，宽以从政，依法治国，改革弊政，成就霸业。

管仲（公元前 730～ 前 645 年），名夷吾，颍上（今安徽颍上县）人。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列国并立、彼此征战不休之际。当时在黄河下游地

区，有齐、鲁、郑、宋、卫 5 个比较强盛的大国。另外，还有邢、遂、谭、纪、杞等小国。大国又分两派：一派为郑、齐、鲁；另一派为宋、卫。小国则依附于大国。管仲的父亲管庄曾是齐国的大夫。到管仲时，家境已经贫寒。管仲少年时熟通“诗”、“书”，懂礼仪，会驾车射箭。为了谋生，管仲与好友鲍叔牙一同做生意。管仲本钱比鲍叔牙少，赚钱后却比鲍叔牙多拿一份。有人背后说管仲占便宜，鲍叔牙对人解释说，他家里困难，我愿意多给他一份。成语“管鲍分金”即指此事。管仲从军打仗时总躲在后边，退兵时却跑到前边。有人说他贪生怕死，鲍叔牙为他辩解说，管仲的勇气天下少有，他这样做，是因为他的母亲年老多病，需要他照顾。管仲知道此事后，非常感激鲍叔牙的知遇之恩。

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荒淫暴虐，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、公子小白分别逃到鲁国和莒国。管仲辅佐公子纠，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师傅。齐襄公被臣下杀死，消息传来，两位公子都急于回国即位。管仲担心公子小白先到齐国，就带领几十辆兵车拦截。果然，在途中追上公子小白。管仲上前阻止，称公子纠回国即位才是正统。鲍叔牙据理力争，管仲无奈，趁公子小白车走远之际，偷偷拉起弓箭，向公子小白射去，公子小白应声倒在车里。管仲以为他已死，就准备护送公子纠回国。谁知公子小白佯装而死，却安然回到齐国抢先即位，他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。齐国出兵打败鲁国，令鲁国杀公子纠

和交出管仲，鲁国只得照办。齐桓公想请鲍叔牙任齐相，鲍叔牙却将管仲推荐给齐桓公。齐桓公惊奇地问道，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？鲍叔牙劝齐桓公化仇为友，齐国的霸业需要管仲这样的盖世奇才，并且指出管仲强于自己有五点，即：“宽以为政，蕙以爱民；治理江山，权术安稳；取信于民，深得民心；制订礼仪，风化天下；整治军队，勇敢善战。”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，立即召见管仲，询问如何使国家富强、社稷安定？管仲说，唯得民心。要得民心，唯爱惜百姓。爱惜百姓，唯使百姓富足，百姓富足则国家得以治理。是以安定则国富，混乱则国穷。齐桓公又问如何处理兵甲、财力不足？管仲说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开发山林、盐业、铁业、渔业，可增加财源。发展商业，取天下物产，互相交易，从中收税，财力自然充足。管仲劝齐桓公一定要使百姓休养生息，让国家富强、社会安定，否则难成霸业。管仲治国称霸之策，令齐桓公精神振奋，遂拜管仲为相。

管仲为相后，提出“尊王攘夷”的方针。“尊王”就是尊奉周天子。时周王室衰微，经济倒退，军事孱弱，以致列国互相争战，中原无主，边境少数民族入侵。管仲认为，为防止少数民族入侵，则必须“攘夷”于外；必须以“尊王”作为被诸侯视为正宗的旗帜，由齐桓公执掌，代天子行征伐之令，则天子便会尊齐桓公为诸侯之长。

管仲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在行政方面，管仲

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，健全官制，以利于行政管理。在军事方面，管仲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每年春秋通过狩猎训练军队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。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装备匮乏问题，规定犯罪皆可用盔甲和武器赎罪。在经济方面，管仲提出“相地而衰”的土地税收政策，就是以土地的肥瘠征收数量不等的赋税，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，以此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同时还鼓励工商业发展。从此，齐国经济走向繁荣。

管仲得知宋桓公即位，需要得到诸侯的认同，遂建议齐桓公以“天子”为旗号，会合诸侯，以成就霸主地位。齐桓公在得到周天子的支持后，即通告宋、鲁、陈、蔡、卫、郑、曹等国三月初一到北杏（齐国地名）会盟。实际上，届时只去了 4 个诸侯，齐桓公意改会盟日期。管仲说，三人成众，现在已经有了 5 个国家，不算少了。改期，则失信于人。于是，诸侯国在约定时间内开了会。齐桓公对诸侯说，王室衰微，我奉天子之命，会合诸位，一起商量如何扶助王室。会上，诸侯推举齐桓公为盟主，并制定盟约。盟约规定，尊重王室，扶助弱小国家，共同抵御“夷狄”入侵。倘有违背盟约者，则其他各国要采取联合攻击行动。

在管仲的辅佐下，齐国逐渐壮大，先后征服鲁、宋、陈、蔡、卫等国。公元前 667 年冬，齐桓公召集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滑、滕等国国君，在宋国会盟。当时，周天子的代表召伯以天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

的名义，授予齐桓公侯伯爵位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。

北方山戎经常侵扰燕国，令燕国难以抵挡，遂向齐国求救。此时，齐桓公正全力对付南方的楚国，无意支援燕国。管仲语与桓公，征伐楚国的前提，必先胜山戎，北方安定，则征伐南方无虞。齐桓公遂出兵讨伐山戎。山戎战败后逃到孤竹国（今河北省西北）。管仲继续挥师北上，迫使孤竹国也投降了齐国。以后齐桓公又多次联合他国，反击北方狄人的入侵。

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，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、六次和平会盟，还辅助过一次王室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九会诸侯，一匡天下”。

公元前 645 年，管仲病重，齐桓公前去探望，当谈到以后谁可辅佐国事时，管仲说，隰朋为人忠厚，可以帮助治理国家，而易牙、竖刁、卫公子开方则是 3 个小人，不可任用。齐桓公说，易牙能烹自己的儿子给我做肉羹，难道还不是真心对我好吗？管仲回答，不爱自己孩子的人，没有人性。没有人性的人怎会忠于国君？齐桓公又说，竖刁宁愿伤残自己的肢体，开方父死都不回去奔丧，都一心侍奉我，难道不可以信任吗？管仲反驳说，此二人之举，违悖人情。违悖人情之人也不会忠于国君。齐桓公不听劝告，在管仲死后 3 年，齐桓公果然被易牙、竖刁、开方 3 人害死。随着齐桓公和管仲的相继过世，齐国的霸业也就付之东流了。

管仲堪称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。他主张法治，使举国上下不分贵贱皆以法为守。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坏，关键在于能否依法治国。同时，管仲也非常重视发展经济，说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认为尊重民意，顺应民心，国家才会兴旺发达。管仲的这些思想对历代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，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。

2. 智勇兼备的赵国名相蔺相如

初为门客，谋略过人。出使秦国，完璧归赵。渑池之会，不辱他国。因功为相，忍辱负重。

蔺相如（约公元前 330～前 270 年），战国后期赵国人。赵国后期七雄并立，以秦国和赵国最为强大。秦国自商鞅变法后，厉行耕战政策，以并吞山东 6 国为战略目标。公元前 283 年，赵惠文王得到无价之宝和氏璧。玉璧玲珑剔透，晶莹明澈，放到暗处，熠熠发光。赵王爱不释手。秦昭襄王得知此事后即派使者与书赵王，愿以 15 座城池交换和氏璧。与大臣们商量对策的赵王担心同意秦国的条件后秦国不履行诺言；如不同意则又害怕秦国借此入侵。赵国君臣束手无策，惶恐不安。宦官缪贤向赵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，说他胆大心细，能不辱使命；并说自己曾犯罪，企图逃往燕国。蔺相如阻止说，先生怎知道燕王会收留您呢？缪贤说，我曾陪赵王和燕王会晤于边境，燕王握着我的手，要与我交个朋友。蔺相如说，赵强燕弱，先生又得赵

王宠信，所以燕国想与先生结交。如今您逃到燕国，燕王恐得罪赵王，定会把您送交赵王治罪，现在您不如主动向赵王请罪，以求豁免。缪贤采纳了蔺相如的建议，遂得以赦免。赵王听后即召见蔺相如询问对策。蔺相如认为秦强赵弱，不能不答应秦王的请求。赵王道出上述担心，蔺相如说，秦国用15城池换一块玉璧，赵国如不答应，便有理亏；如秦王纳玉璧而不交城，则理亏在秦国。权衡利弊，让对方理亏为上策。赵王于是拜蔺相如为大夫，捧璧出使秦国。

秦昭襄王听说赵国使者带玉璧而来，非常高兴，立即召见蔺相如。相如恭敬地献上玉璧，秦王赞不绝口，还传给大臣及后宫美人观看，但却只字不提城池之事。蔺相如见秦王无意给予城池，就急中生智称玉璧上有斑点，请求指给他们看，秦王信以为真。相如持玉璧后退几步倚柱怒称：和氏璧乃天下至宝，赵国之臣都称大王情愿用 15 座城池来换乃是谎言。我却反驳说，百姓尚且能讲信义，何况大国的君主？这样，赵王斋戒 5 日后，才令我送来。可是大王对此却不恭不敬，让手下人传看此宝，我看大王并无诚意交换，为此我收回玉璧。如果大王以武力相逼，我宁可以头与玉璧一同碎于此柱。秦王害怕，连忙赔礼，令人拿来地图，指出要给赵国的 15 座城池。相如考虑到秦王不可信，便假称秦王也要斋戒 5 日，再举行收璧仪式，方可献上玉璧。秦王只好答应。蔺相如令手下人扮成商

人，偷偷从小路将玉璧送回赵国。

5天后，秦王召集群臣，邀请各国使臣，参加接收玉璧的仪式。蔺相如却空手而至，他镇静地说，秦国自穆公以来，前后有20余位君主，没有一个讲信义的，我担心再受欺骗而对不起赵王，所以令手下人将玉璧送回赵国。现在请求大王治罪。秦王大怒，欲将相如斩首。蔺相如从容地说，秦强赵弱，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之事，绝无弱国欺负强国之理。大王若真想得到玉璧，不妨先割让城池，然后派使者取回玉璧，赵国决不敢辜负大王。我欺骗大王，罪该斩首，各国知道秦国为得一块玉璧而杀了赵国使者，必能分辨是非曲直。一席话令秦王哑口无言，便以礼相待，送走了蔺相如。蔺相如能够“完璧归赵”，充分显示了他临危不惧、胆略过人的才能。

此后，秦王对赵国一直耿耿于怀，总想伺机报复。公元前279年，秦王邀请赵王到渑池（今河南渑池县）相会。赵王惧之，不敢擅往。上大夫蔺相如与大将廉颇一致认为，赵王如果不去，则示弱于秦。相如愿随赵王左右以为保护。廉颇则愿辅佐太子，倘若赵王逾期不归，就立太子为王，以绝秦国挟赵王之心。

约会期至，酒宴中秦王对赵王说，闻赵王喜乐，请弹奏一曲以赏我耳。赵王不敢推辞，勉强弹奏一曲。秦国的御史当场记下此事，称：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，赵王为秦王鼓瑟。

赵王气得脸色发紫，却无法抗辩。这时，蔺相如手持瓦盆，跪在秦王面前说，赵王听说秦王能演奏秦国的音乐，请秦王敲个曲子！秦王脸色骤变，蔺相如举起瓦盆厉声说，大王不要以强凌弱，5步之内，我能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！秦王左右武士欲杀相如，相如怒吼一声，吓退武士。秦王无奈，只好勉强地敲了几下瓦盆。蔺相如吩咐赵国的史官记下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赵王同秦王相会于渑池，秦王为赵王敲盆。秦国大臣不服气，让赵国割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。蔺相如马上反驳说，请秦王割让咸阳为赵王祝寿。秦王见不敌赵国君臣，欲发兵赵国，却又惧已在边境严阵以待的赵国大军和蔺相如、廉颇这样的人才，便同赵王结为兄弟。为取信于赵国，还将己孙异人送到赵国做人质。

渑池之会后，蔺相如以功高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上。廉颇不服气，扬言要羞辱蔺相如。相如听说后，始终避免与他相会。每次上朝，相如都称病，不与廉颇争高低。一次，蔺相如出门，望见廉颇，便回车上躲避。相如的舍人们抱怨说，我们离开亲人来侍奉先生，只因仰慕您的高尚节操。如今先生与廉颇同列，受他恶语中伤，反而惧怕，这种屈辱我们无法忍受，请求辞别。蔺相如说，诸位以为廉将军与秦王相比如何？舍人们回答，不如秦王。相如又说，秦王有这样的威势，我尚且在朝堂上怒叱于他，侮辱其群臣。我虽不中用，难道还怕廉将军吗？只是我认为强秦之不敢冒犯赵国，是因

为赵国有我们二人。二虎相争，势不两立，必会两败俱伤。我只是视国家危难为至重而已。廉颇耳闻蔺相如的这番话，深受感动，便负荆请罪，二人从此结成生死之交。

蔺相如是战国时期出色的外交家，他的机智勇敢使自己国家不辱于强国。他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不以一己荣辱为念的高尚品德，赢得了传世美名。

3. 持“连横”之策的秦相张仪

初为说客，以谋仕途，历经磨难，壮志不已；游说秦国，力主“连横”，投机取胜，因功为相。

张仪，战国时期魏国人，从小喜爱读书，分析天下大事，有远大理想和抱负。成年后，他周游列国，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可是人们一看到他那穷困潦倒的样子，就总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。张仪曾到楚国，求见楚威王，楚威王不见他。张仪只好投靠到令尹（楚国最大的官）昭阳门下做门客。有一次，昭阳同客人在水池边的亭子里饮酒，有人提议请昭阳取出楚威王赏赐给他的“和氏璧”，让大家见识一下。昭阳令人取来玉璧交给在场的客人传看。不料，天空涌起一片乌云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昭阳担心客人为雨所困，赶紧招呼散席。可不知玉璧传到谁手里就不见了，昭阳很不高兴，但又不好得罪客人，只好让大家回去。俗话说，人爱富，狗咬穷。因为门客中张仪最穷，所以遭到怀疑。昭阳令手下人用鞭子抽打张仪，逼他招供。张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